

吉林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



JILIN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THESIS

\* \* \* \* \* 吉林大学 \*  
\* 硕士学位论文 \*

试论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  
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影响

专业：中共党史

作者：宋振文

指导教师：邵鹏文 教授

一九八八年五月

## 论 文 提 要

本文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国共两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各具特色，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起主导作用。

国共两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体现在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发展过程之中。

国民党在领导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设有青年部，学校设有训育机关负责学生工作；侧重于总体上领导，而在具体运动中指导较弱；极力用三民主义宣传教育学生，力图使学生运动完全在国民党要求下进行；内部左右派分化明显，致使学生运动产生分裂。

共产党在领导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中，建立了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得力助手，具体领导学生运动；既从总体上把握学生运动，又对学生运动进行具体领导；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学生，指导学生运动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方向；不断加强对学生组织的建设，以学联组织为纽带来领导学生运动。

纵观国共两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显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学生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革命的学生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转入低潮。但革命学生运动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永远载入史册。

## 试论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 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和影响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是这一时期革命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客观地评价国共两党对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领导，对于我们全面地完整地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有重要意义。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领导多有著述，而对国民党与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关系涉及较少，或有片面之辞。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是在国共合作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作为大革命群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运动的情形，必然打上国共合作的烙印。本文拟对国共两党如何领导或影响学生运动作一初步探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虽然政纲有所不同，但是在反帝反封建这一共同目标下，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活动中。

(一)早在五四时期，孙中山就比较重视学生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当全国学联成立之时，孙中山正住在上海莫利爱路廿九号。当时，他每天都接见学生代表。据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说：中山先生“对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的注意和最大的热烈去吸收的。在上海见北京学生代表，每次总谈到三四点钟，而且愈谈愈有精神。”①有一次他会见上海学联会代表程天放时说：“青年学生激于义愤，出来奔走呼号，挽救国家的危亡，我是很同情的。……希望大家坚持到底，不要虎头蛇尾。”②1919年10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称：1919年8月5日，全国学联评议部闭会式，特请孙中山先生演说，介绍“革命党”。在国民党改组阶段，国共两党已经开始共同领导全国学联的工作。1923年8月，全国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参加会议的各地学生代表到达广州之时，广州市国民党党部、教育局、学联、总工会代表到码头欢迎。全体代表借寓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宿舍。代表中推韩觉民、范体仁、王基永、端木恺等七人于8月12日谒见孙中山，经中山先生训勉，并指派廖仲恺指导开会事宜。派陈树人负责招待任务。③代表中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亦分别访谒广州方面的负责人。党团也派谭平山指导一切。8月15日，大会正式召开。孙中山亲自到会并作了长篇演讲。他看到青年“学生知道国事要紧，联合团体来解决国事”，很高兴。

并认为“这是中国的绝大希望。”④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廖仲恺、徐国卿、邹鲁，中共党员谭平山等向大会致词。学生代表中由于国民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占少数，无党派者占多数，阶级成份复杂，因此在讨论请孙中山组织中央政府及行使总统职权、对时局应持态度、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和学运目标以参加国民革命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等主要议案时，学生代表发生争执。会议期间，廖仲恺、谭平山多次进行指导和启发，因而大会统一了思想，学生代表们认识到：过去的学生运动，“失败的原因因为没有运动的目标。”今后，“我们要全体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上，赞助三民主义，与主张三民主义者携手合作使三民主义早日成功，以达到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目的。”⑤大会在统一了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了许多重要议决案。这些议决案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适合人民的要求，满足了全国学生的愿望。全国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揭开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大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序幕。

(二)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召开。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次大会标志着大革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工农

群众运动的发展。从1924年下半年起，全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全国范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就是革命高涨的重要标志。为了使学生在工农运动中发挥先锋、桥梁作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召开了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4年8月，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开幕式上，国民党党员吴稚晖、于右任、施存统，共产党员邵力子、恽代英等发表演说。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还派郭寿华参加了大会。共产党上海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方面负责人恽代英在演说中明确地指出了学生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方向。他指出：“卖国之徒无国蔑有，惟在各国国民监督极严，遂使野心者欲卖不得，故学生会救国事业，应注意于培植大势力，足以监督一切，使任何人，不得任意作祸国殃民之举，同时，须使人人知国内军阀之猖獗，原因由于外国强力之侵入。合众力以抗外侮，外侮息则内乱自平，然此二作尤非具革命的精神不可。”⑥在反帝反封建这一总的精神下，这次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十八个议决案，以作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方针。宣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指出下列几点：(1)我们从前太没注意到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便是学生会的根基还没巩固，学生会的内容还未坚实，一般同学还未能把学生会看作是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能自外的团体，所以学生会以便不能做一个强有力的社会运动的组织。”⑦(2)“政治方面提出了收回关

税权、司法权、教育权等口号，”由于“感觉与各界人士合作，以打倒反动政局的必要，”因而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与世界革命势力相联合，而且应当跟随更勇敢更精进的国民党人，为民族独立而战争。”⑧ (3)“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反对专制教育的口号，在学生自身方面……主张一切学生的活动都归学生会办理，学生会要干预一切与学生有关的事情，学生会要引导学生做各种社会活动。”⑨

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表明，学生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不仅有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即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而且正确规定了学生政治斗争的具体目标，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学生运动必须与谋学生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组织上也明确了加强与维护学生自身利益的办法和措施。可见学生运动走上了正轨。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组织和领导的结果。据会后参加大会的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郭寿华给邹鲁的信中透露：“此时之全学联，已由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领导，并由国民党供给经费。”⑩这种说法虽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但至少可以说明，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和组织了全国学联。

(三)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国共两党便领导各地学联发动学生参加当时广泛兴起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早在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就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国民会议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建议“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救国救民的新局面。”⑪这一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军阀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10月，冯玉祥率部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所部改称国民军。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旧军阀被推翻，新的军阀政权尚未巩固的有利时机，在全国发起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孙中山先生赞成并参加了这个运动。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动身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明确宣布召开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推翻军阀统治，以谋求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他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当时，他曾指明必须各省学生联合会为团体代表。同月，孙中山经长崎，留日中国学生会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号召各省学生联合会要促成国民会议。同时，希望还要对海外各地留学生联络，成立一个国外学生联合总会，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与打

倒列强的侵略。”<sup>⑫</sup>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于发动学生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是何等重视。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号召学生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连续发表促成国民会议的文章。恽代英在《为“国民会议”奋斗》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国民会议的主张，号召青年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使军阀魔鬼“不敢不召集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中国青年》还发表《“国民会议与青年利益问题——我们的主张”的文章，号召一切被压迫的青年联合起来，为青年自身的利益，幸福而奋斗！在《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国民会议运动确是目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且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级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

广大青年学生热烈响应国共两党的号召，全国学联总会发出通告说：“为求我们对于国民会议能为有力地赞助，总会更望各地学生联合会利用此种便于号召的口号，切实谋各地学校学生的联络，使各地联合会成为各学校学生所拥护之机关，与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sup>⑬</sup>该会还指令各地学生联合会定期召开代表会议，筹商如何促成国民会议。上海学生首先起而响应。11月23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大学、大夏大学联合其他爱国团体共六十

二个公团发表通电，“赞成孙中山之政见”、“希全国公团一致赞助。”④接着，全国学联、暨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上海大学、浙江同乡会二十七个团体共五十三人，在天潼路及福德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决定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推选宣中华、俞秀松等七人为筹备委员。12月14日，上海一百四十三个公团举行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不久，全国各地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学生均参加了这一活动。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反动政府极为恐慌，妄图召开善后会议来抵制国民会议。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学生们纷纷开展宣传活动，戳穿段祺瑞的反动阴谋。他们散发大量传单，到处张贴标语，组织街头讲演队。据上海《民国日报》报道，12月19日，在上海中华路、城隍庙、天后宫等处，就有四十个讲演队，听众达六万数千人。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召开，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到此时国民会议运动发展到全国运动总汇合的更高阶段。

与此同时，全国学生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沙俄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当1923年9月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以后，人民要求恢复中苏邦交的呼声越来越高。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的逝世，在

中国人民中引起了深切的哀悼。1月26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国民青年俱乐部”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四个团体发起遥祭列宁大会，通过这次遥祭大会，广大学生要求中苏建交的呼声更高了。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同苏联代表举行复交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帝国主义横加阻拦，军阀政府出尔反尔。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军阀政府的无理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及时指出：“军阀政府所以有承认的倾向，却在于中国平民意志之表现。……假使北京军阀政府不能脱离东交民巷之太上政府的束缚，不能代表中国平民的利益，中国的平民便应当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问题。”<sup>⑯</sup>

抗议最激烈的是北京学生。他们大有重演五四运动之势。1924年3月，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说：“倘先生犹执迷不悟，则敝会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以殷鉴。”<sup>⑰</sup>3月28日，北大、师大等四十余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29日下午，全体学生游行示威。这一计划虽然由于反动军警的阻挠，未能全部实现，但是却起到了敦促外交的作用。不久，中苏正式恢复邦交，废除了帝俄时代俄国与中国鉴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五十多团体组

成反帝运动大同盟。接着，上海、武汉、湖南、山东、天津等地学生联合会均参加了反帝同盟，积极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9月7日，是《辛丑条约》签定的日子，由反帝大同盟发起决定，9月3日至9日为全国反帝运动周。全国各地学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活动，反帝运动走向高潮。以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便和国民会议运动融汇在一起了。

在这两次较大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两党都把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作为当时的工作中心。发动包括学生在内的群众运动是工作重点。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把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从广东一隅走向全国，“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要途径。所以国民党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国民会议运动上来了，而中国共产党第四、五次时局主张和党的四大，也把国民会议运动做为自己领导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于是，国共两党派出大量党员在全国各地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学生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和许多讲演指令号召学生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他派了许多宣传员。代表他到全国各地，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张家口、热河等地，发动和领导运动。如派往江西的两位宣传员，在九江、南昌、南城铁路及德安、永修各县，仅半个月，就接洽了包括学生在内的二百余团体，演说三十多次，

使广大群众和学生对国民会议“均十分了解。”其他各地情形大致相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如上海的邵力子、俞秀松、郭景仁、刘清扬、向警予，恽代英、赵世炎、夏之栩，山东的王烬美，天津的邓颖超，于方舟，广东的周恩来，苏兆征，江西的方志敏，湖南的郭亮，北京的李大钊等，他们或在各地，或在全国，发起和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号召和领导学生进行广泛地宣传。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机关报《民国日报》，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都刊登了大量指导性的文章，报道了各地学生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情形，对广大学生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四)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从各方面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就是这一伟大革命斗争的一个方面。

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是大革命时期一次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本世纪二十年代，基督教在我国已有比较广泛地传播。传教士所到之处强占土地，建立教党，肆意寻衅，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尤其是它以奴化思想来麻醉中国人民，企图使中国人民安于其铁蹄践踏之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的侵略，早在1922年，青年学生们就掀起了一次反对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的非基督教学

生同盟，首先在上海各学校中组织起来，接着其他各地也纷纷建立。不过，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中国和干涉中国革命的运动，在1924年前并没有深入普遍地开展起来。因为当时没有永久机关和出版物来指导和联络这种运动，所以不久就停顿了。

伴随着大革命的脉搏，各地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斗争又活跃起来。1924年8月，上海各校爱国学生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他们宣布大同盟的宗旨是：“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成立后，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均成立了非基督教大同盟。1924年圣诞节前，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决定在圣诞节期间开展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规定1924年12月22日至27日为“非基督教周”，要求各地同时行动。各地的学生积极响应，到圣诞节前后，各地非基督教大同盟掀起了宣传高潮。在许多教堂和教会学校里贴满了反对基督教的标语、传单。长沙非基督教同盟散发了《非基督教运动节檄告同胞》等传单五万张。广州甚至深入到教堂和教会学校内去散发传单。南京非基督教同盟的宣传队用巧妙的办法把传单散发给参加教会活动的教徒手中。非基督教运动周使各地教徒在圣诞节期间，有的停止庆祝，有的提前或推迟庆祝，使帝国主义分子

惶惶不可终日，平日的威风扫地。1924年和1925年的非基督教运动都在非基督教运动周形成高潮。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各地揭露了基督教会所办学校的黑幕，因此青年学生进一步提出了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要求。较早起来斗争的教会学校之一是广州的圣三一中学。该校是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悬挂英国国旗，在香港注册，不受中国政府任何约束。该校爱国学生于1924年3月组织学生会时，受到传教士无理干涉，学生实行罢课。5月，该校当局又蛮横阻挠学生举行五·九国联纪念活动，学生再次罢课反抗，并发表了《广州圣三一学生退学宣言》，不久学校被迫停办。圣三一中学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支持。5月4日，学联召开五四纪念会，会上发表宣言说：“圣三一学生要求自治，学校办事人竟不允许。”“现在圣三一的学生正在那儿与他们奋斗，我们赶快去援助他们吧！”<sup>⑦</sup>浙江学生也于同日召开五四纪念会，会上发表援助圣三一学生的宣言，希望他们“协力坚持”、“勇猛前进”、“与其为奴，无宁失学。”<sup>⑧</sup>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宣言，声援圣三一中学学生的斗争，号召全国学生“一致团结，反对奴隶教育，勉力民族运动，以雪我耻辱而光我民国。”<sup>⑨</sup>广州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收回教育权，并提出四点最低限度的要求：“（1）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与校